和本人也把疑点集中到淮北士绅徐子若身上，并未认定是李鸿章所为。

三、帝后党争和翁氏开缺原因。在19世纪末年的清朝政局中，帝后党争是一个重要内容。翁同和作为帝党的领袖，自然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帝党后党形成问题，与会者在研讨中颇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后党形成于“祺祥政变”，帝党则在中法战争后形成雏形。另一种意见认为帝党源自“清流”，于甲午战争时形成、戊戌变法是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的产物。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帝党后党是甲午战争后由主战派和主和派分别形成，光绪与改良派逐渐结合的过程，也是帝党逐步形成的过程。还有的代表从甲午战争时言官“倒李”活动具体分析了帝后党争的内容。

代表们认为，翁同和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中起了关键作用，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有的代表针对台湾学者有关翁氏支持维新是“爱国情操与个人野心合流”的说法展开论述，认为翁氏支持变法，忠君爱国、为君分忧是最主要的原因，个人野心并不是无所不在的心理因素。还有的代表认为翁同和是维新运动中的稳健派代表，他们希望改革，但不赞成激烈手段。

关于翁氏开缺问题在会上引起热烈讨论，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翁同和罢官出自慈禧的决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毅。有的代表强调这是慈禧为首的后党破坏维新变法的重大步骤。另一种意见认为翁同和开缺的原因由多种因素构成，翁氏与光绪之间的裂痕形成冲突，而御史指明参劾翁同和与张荫桓朋谋纳贿，使光绪态度明显变化。有的代表提出，翁氏开缺与维新派有关，康有为想取而代之，充当太傅。也有的代表认为，翁氏罢官，本人似有求去之意。

除了上述三项以外，代表们提供的论文还涉及了翁同和与张謇的关系、翁氏家族、翁氏乡里交往、翁氏教育思想、翁氏研究资料的收藏及整理等问题，第一部大型的翁同和传记也在会议召开前夕问世。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翁同和研究专题讨论会，展现了学者的最新成果，提出了不少问题，必将推动研究的深入。

北京市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董建中　黎烈军

1994年7月13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市历史学会共同举办的“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29个学术研究单位、六十余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发生在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及其影响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而又热烈的讨论。兹将与会者发言整理如下：

一、甲午战争及中国失败原因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屈辱的条约而告终。中国为什么失败，其原因何在？与会者一致认为清统治者的腐败和战争策略的失误是其根本原因。

李侃（中华书局编审）在讲话中指出，清政府三十年军务最终落得个“樯橹灰飞烟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清政府没有一个战略方针，战和举棋不定。针对“常熟主战误国”的看法，

李侃认为日本发动战争，志在必得，对清政府来说不存在“和”的问题，“和”就是投降，李鸿章主和，又是军队统帅，将帅失志，何谈胜利！李侃还分析了荣成湾“虚防”一事，引申出当时国民普遍缺乏国防观念问题。

关于战与和，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清史所教授）指出，不论战与和，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对于主战抵抗也应具体分析，主战派中有要求拆铁路、停止使用机器、电讯者，对之不能简单肯定。

郭毅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此次战争中国可胜可败，当时日本人自己分析胜负之比为四六开，他们也没有绝胜的把握。中日双方在军事实力即“硬件”方面相对持平，有差距也很小。然而在“软件”方面，包括战略战术、后勤保障、政治体制等等，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如中国实行募兵制，日本实行征兵制即是明证。郭毅生指出中国军队的腐败不能笼统言之，清军如马玉昆部队是很能打仗的；许多海军将领在战败后自杀殉国，十分壮烈。关于直隶提督叶志超的评价问题，郭毅生指出，战争伊始，叶志超就向清廷指出六点建议，其中就有后继兵力问题，说明叶志超还是比较有战略眼光的；朝鲜战场牙山、成欢等战役，我方处于劣势，叶志超的撤退在一定意义上保存了清军的实力，这应该给予肯定。

王道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在题为《慈禧与甲午战争》的发言中通过大量史料和数据分析指出：慈禧修颐和园共花费五、六百万两白银，此举对战争影响不大。光绪十年以后海军没有添炮购船，应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来考察。王道成特制强调了甲午年慈禧六十寿庆对战争的影响，户部为此筹银五百余万两，而为战争筹款二百五十万两，慈禧本人视此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日本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而发动战争，知道中国人不可能全力应战。慈禧对战争的态度因战争受挫由战转和，寄希望于外国的调停。王道成总结指出：不该对战争产生影响的，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实际上起了极坏的作用，慈禧反映和代表了清政府的腐败。

潘向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谈到了清政府的战略失误。1885 年以后，以防日为主的国防战略逐渐放弃，慈禧寿庆是战略指导思想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战争前夕，推迟战争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是对中国有利的，在撤回牙山军队问题上，李鸿章等上了日本人的当，牙山战役随之揭开了战争的序幕。战争第二阶段，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旅顺口轻易失陷，京津门户洞开，此时战争已不可挽回。

吴建雍（北京社科院副教授）上溯历史认为，十八世纪清朝是东方最强国，当时并没有丧失海洋意识和国防意识。乾隆时期曾在昆明湖演练水师，后于道光八年解散。清政府片面强调骑射，失掉了开国之初借鉴吸收红衣大炮的那种开放心胸。中日实力的对比差距在战前就已形成。

就近年来甲午战争的研究状况及其成果，何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从三个方面，即丰岛海战、黄海大战和甲午战争的陆战研究等国内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概述。他认为近年来北京、山东、辽宁等地的学者从世界全局、国际背景等新的视角研究这场战争，新的成果不断问世，使整个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二、战争的影响和历史地位问题

如何认识一百年前的这场战争及其影响，与会者一致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一次重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李侃指出：中国变革基本上是从甲午战后开始的，战争的确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变法由此开始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所长，教授)介绍了战争时期的社会舆论情况。当时《申报》、《万国公报》等载文分析战争的得失，提出过类似“持久战”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时人针对战争的失败，提出了变法图强的要求，如有人强调人才重要，要求文科、武科考试，更有人提出学西方，立议院的呼声。

刘桂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近现代思想史着眼分析了战争的影响，认为战争的烽火照亮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视野，中国人找到了日本这一面镜子来反省自己，日本也随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海外基地。在对西学的认识上，由简单的军事层面上升到制度和文化等较深层面。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戊戌的新文化以至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意义更为重大。刘桂生指出，战后学生、知识分子群体的日益成长并与旧制度“断奶”，他们肩负起了民族文化的更新任务。

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在《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发言中指出，战争有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契机。如甲午战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建设工厂的高潮。民族资产阶级新生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要求变革旧政治制度，学习西方，从康梁到孙中山都是沿着这条路发展的。同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战后整个民族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断要求近代化，民族危机以及物竞天择的思想等广为传播，对西方的“民智、民力、民德”思想日益重视，西学开始被全面介绍进来。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现代化的历程。

张振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就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发表看法。他指出《马关条约》第六款废除了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约》，日本已经享有了欧美各国在中国的特权，同时又增加了新的通商条款，中日关系经过战争由平等关系转变成不平等关系。张振昆还考察了战争前后日本进攻的三条路线，即经朝鲜到东北、内蒙，由关外向关内的北线；经琉球、台湾、澎湖、福建，以至华南华中的南线以及山东的中线，并列举史实说明这三条路线也是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路线，甲午战后中国沿海全部受到威胁，日本的侵略更是步步升级。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此次战争对日本的影响如何呢？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在分析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时，不仅要看到明治维新的作用，也要看到甲午战争的作用。战后中国赔款达到二万万四千万两白银，合三亿六千多万日元，而日本国民收入是每年八九千万元。当时的日本人就惊喜若狂：“从未见过这么多钱，政府、私人顿觉无比富裕。”这些钱被用来扩军备战，发展钢铁，通讯等基础工业。另外，1897年日本实行金本位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对台湾、朝鲜大加掠夺，其结果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王晓秋指出：战争使日本“暴发”，同时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地位上升，左右政治、整个社会思想也充斥着军国主义情绪，这也为日本以后发动战争埋下了种子，并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失败。

张寄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指出甲午战后东亚国际力量发生了变化，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领袖，国际事务的天平向日本倾斜。以后历史发展就是英美等国庇护日本，共同欺压中国。

三、如何看待战争的遗产问题

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100年前，但它揭示的客观真理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并留下许多遗产有待后人来解决。

李文海认为甲午战争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极好范例，但对这个结论要做具体分析，落后是综合国力的落后，决不仅指经济的落后，它还包括政治、社会状况，国民素质等诸多因素。

李文海指出，如果把“落后就要挨打”理解成“落后只能挨打”，那就成为了失败主义。

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这次会议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有现实意义。王汝丰批驳了日本某些学者和台湾某些人散布什么“中华概念不清楚，中国概念不清楚，中国人概念不清楚”，他们借口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就认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王汝丰指出，这是他们在蓄意歪曲历史，可以说从 1874 年以来就有了所谓台湾主权问题的争议。在努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今天，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弘扬爱国主义，使人们明晓这段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张寄谦在发言中指出：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棘手的，需要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台湾问题。甲午战后台湾的割让直至二战后台湾的收回，不是时间的流水账，相加减得出中国失去台湾 50 年这么简单。这 50 年中台湾人民所受的心理毒害，其文化和心理与大陆的离异因素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对今天的“后李登辉时代”，更值得我们重视。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在谈到战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支援台湾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时指出，刘永福是应该大力宣传的民族英雄。让人们明白战争前后的历史就可以回答台湾当局某些人的“何为台湾”的问题。

吴天颖(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所教授)在会上向各位学者详细介绍了钓鱼岛的情况，指出钓鱼岛大陆架的石油储量初步探明为 800 亿桶，相当于一个波斯湾，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但至今未能收回。日本早在 1885 年就开始觊觎该岛。而《马关条约》关于台湾的割让也只是笼统地说是“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进行有悖于“搁置原则”的活动及其议论。他们妄图占有钓鱼屿，就极力使之与《马关条约》的签订脱离关系而求助于国际法中的“无主”、“先占”原则，日本政府对此也大力资助。相比之下，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存在着很多“禁区”，存在着很大差距。吴天颖呼吁国家在政治上支持边疆史地研究，史学工作者也要担负起时代的重任，否则既对不起前人，也愧对后世子孙。吴天颖最后指出，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必须使两国人民了解真实的过去。首都师大历史系徐蓝副教授也即席发言。

研讨会开得热烈而活泼。郑文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编审)代表社科出版社向研讨会赠阅《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戴逸、杨东梁、华立著)并就资助出版此书谈了些感想，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东梁为与会者签名留念。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面临着救亡的重任，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处于世纪之交，我们的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前仆后继的两个阶段！抓住机遇，促进现代化大业的实现，这才是今天纪念中日甲午战争 100 周年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戚俊杰　王记华

九月的威海，沧海澄碧，长空如洗，滨城新姿，景致怡人。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国史学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共威海市委、威海市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发起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九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威海举行，大会历时五天。大